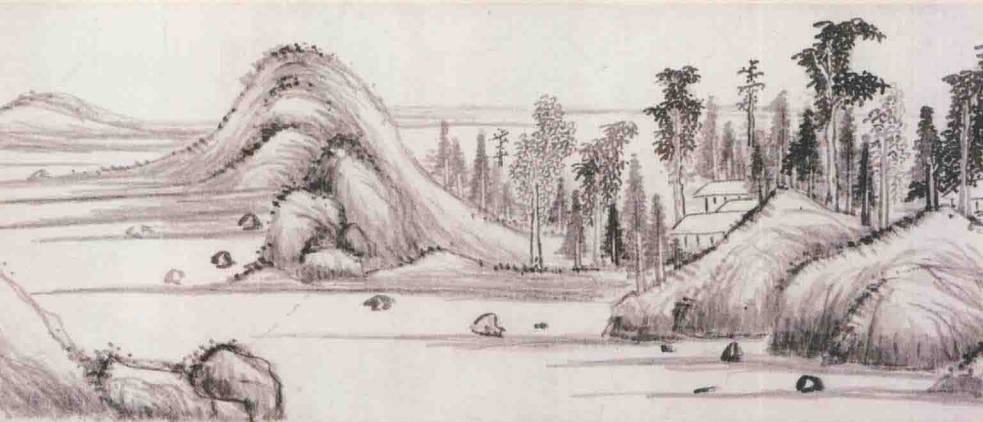


嘉定文派与明代诗文 研究论集



黄霖 郑利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嘉定文派与明代诗文 研究论集

黄霖 郑利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嘉定文派与明代诗文研究论集 / 黄霖、郑利华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325-7875-7

I. ①嘉… II. ①黄… ②郑… III. ①古典散文—古
典文学研究—中国—明代—文集②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中国—明代—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0733 号

嘉定文派与明代诗文研究论集

黄霖 郑利华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颀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76,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875-7

I · 2993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2004年4月14日,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与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曾联合举办“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学术研讨会。时隔十载,2014年11月8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宣传部、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在上海嘉定区共同主办“嘉定文派与明代诗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学术会议研讨主题的延续和拓展,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余位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重点围绕嘉定文派以及明代诗文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追溯起来,嘉定文派这一概念是由归有光曾孙、清初著名文学家归庄及嘉定知名文人朱子素共同提出的,近些年来也有多位学者重新提起,说明该文派正受到学界的关注。明代自归有光起,中经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等“嘉定四先生”,再到侯峒曾、黄淳耀等一批文人学者——他们为学注重儒学本源,崇尚礼乐,主张经世致用;为人以乐易淡荡、恬于荣进相砥砺;为文则在抒情叙事、写景拟物等方面多有成就,形成一个具有明显地域人文特征的文学流派,当年得到了明末文学家钱谦益的大力弘扬而名震文坛。研究嘉定文派,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嘉定地区作为底蕴深厚的一大文化重镇,在人文积累、文人交流、文学传承等方面的重要特点,而且有助于探察该地区在明代文学乃至文化史上的特定位置

和影响。

本书为此次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内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于嘉定文派的源流及其文学史意义的考察;二是围绕归有光、徐学谟、黄淳耀,以及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等“嘉定四先生”所展开的专题研究;三是有关明代嘉定文人著述及上海地区文学文献的梳理及考述;四是相关文人作家与嘉定地区的文学关系研究;五是地域文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探析。论文的顺序排列,即大致按照论述的内容分类编次。

本书的编辑出版,承蒙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的诸位学者的倾力协助,也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长、奚彤云副总编辑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黄霖 郑利华

2015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嘉定文派”散论	黄霖 1
嘉定文派源流考述	夏咸淳 14
论黄淳耀在嘉定文派中的地位	陶继明 37
杨维禎在嘉定的活动及其影响考论	孙小力 56
明代嘉定文人诗文集概述	顾建清 70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上海明代文学著述	钱振民 83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 ——兼相关别集提要补正	何宗美 103
“无意求工,滔滔自运” ——论归有光的诗歌	彭国忠 125
归有光寓嘉佚诗文四则	王光乾 149
明代后期嘉定文人群体诗学旨趣论析 ——以徐学谟及“嘉定四先生”为中心	郑利华 157
徐学谟王世贞交游述略	王晴璐 184
从徐学谟至娄坚再至钱谦益 ——明代嘉定文脉传承之考论	刘霞 194
选择放弃好难 ——李流芳“怀两端”的科举考试心态	邬国平 260

李流芳兄弟的经世志业与困境

——由李名芳的馆课谈起 连文萍 279

李流芳文学著述考 李 柯 303

明朝的嘉定闲话 朱瑞熙 322

影响中国近古文学观念的三大要素

——兼论地域文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 左东岭 327

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的创作心态和记主的商贾精神及

个性自由 陈书录 347

李攀龙、王世贞对日本古文辞学派的影响

——以荻生徂徕的书信为中心 顾春芳 361

白居易与明代吴中诗坛 周兴陆 377

地域文化与明中后期诗坛 朱丽霞 387

明王朝忠烈遗孤侯涵生平考述 大木康 401

明清群体合像文本的抒情向度 毛文芳 427

“嘉定文派”散论

黄 霖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20 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或许是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的影响,普遍对明清时期的诗文研究比较薄弱。一时间,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包括明代断代文学史著,在论述明代的文派时,往往辗转相抄面上的一些习见,几乎都没有顾及清代中后期后渐渐淡出的嘉定文派。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明清诗文的研究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今翻阅 2005 年出版的《上海文学通史》,发现已提到了“嘉定文派”^①,但也只是一言带过,并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后的几年中,陆续读到了多篇专论嘉定文派的论文,令人振奋。在这些论文中,有的提为“学派”,也有提及“诗派”,但我觉得,假如要概论明代嘉隆以后,以归有光、四先生与黄淳耀等为代表的这一派文士来说,无疑是用“嘉定文派”更为贴切,因为这批人,从总体上看,并不长于“学”,这正如钱大昕在对编《嘉定县志》的张应武、唐时升、娄坚、郑闲孟、李流芳等人时说,“诸公皆私淑震川,以文章名一时,故词笔雅驯,而考证殊多疏舛”^②。而从文

① 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0 页。

② 钱大昕《题韩浚嘉定县志后》,《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9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0 页。

学创作而言,其文名也明显大于诗名,更何况现代广义的“文”,本来也可将“诗”包容在内,所以还是提“嘉定文派”为好。

所谓“文派”,这里可作为“文学流派”的简称。凡在一定的时段或空间内,人际关系上有着某种联系,文学志趣上有着一定共性,成员之间能同声相应,薪火相传,且不时有代表人物冒出的文学群体,当可承认它是一个文学流派。其流派提出的口号越鲜明,越合理,就越有号召力与影响力。嘉定地区从明代嘉隆以后,以归有光(1506—1571)到唐时升(1551—1636)、娄坚(1554—1631)、程嘉燧(1565—1643)、李流芳(1575—1629)四先生及黄淳耀(1605—1645)为核心,始终有一批文人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前后相继,在文学思想、诗文创作及治学态度、为人作风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或相通的特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流派。

最早意识到这一流派的存在,似是侯峒曾。他在为唐时升的《三易集》作序时说:

文章之变,作者代起,其于秦汉魏晋六朝唐宋入主出奴,纷如聚讼,近更欲扶去町畦,飏煜电发。而深心好古、不尚雕饰之士,谓吾吴古学一派独在祁川,盖以四先生云。^①

此文开头从“文章”谈起,最后却归结为“古学”一派,究竟是谈文还是谈学,可能是将两者合而为一。又,此序着眼在唐时升与四先生,与后来一般所论的“嘉定文派”的视阈从归有光到黄淳耀以后也有不同。所以只能说是“意识到”而并不十分明确。稍后,著有《嘉定屠城纪略》的嘉定籍人朱之素在《与友人论文书》中谈及自己所编之《吴瞿文献》时,对“嘉定文派”的认识比较明确。他说:

^① 侯峒曾《三易集小序》,唐时升《三易集》卷首,明崇祯刻清康熙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若吾邑文献，岂忍泯阙，弟欲以一集分前后编，前编征文，后编征献。征文者以文从事，始于宋之创县，卒于明之崇祯。……吾邑文派，出自昆山。前乎四先生时，如傅元凯之才略、张茂仁之经纶、潘子实之理学、龚子元之政化，皆熙甫入室弟子。今读其遗文轶稿，如睹熙甫，而湮没无传，莫有知为归氏之学者。以此汲汲焉心摹手追，而并不能无遗憾于娄、唐诸公也。^①

这里就明确提到嘉定的“文派”“出自昆山”归有光，到四先生，且还有其他一些人。朱子素继《吴瞿文献》后，又编有《历代遗民录》。《历代遗民录》编成后，曾请他的朋友、归有光的曾孙归庄作序。但归庄一时“诺而未为”，直到十年后，朱氏“墓有宿草”时，归庄才写成了一序^②。于此之后，归庄在康熙七年（1668），为黄淳耀的学生、侯歧曾的儿子侯泓所作《侯研德文集序》时说：

文章之事，随世而变，宗派不同，流弊亦异。弘治、嘉靖间，作者各辟门户，其后屡变，至万历而极。于是天下之士，患于识之不足，而惑于异趋。然而巨儒宿学，不绝于世，至近世而正宗昌明，真伪邪正，判若白黑。……然嘉定之文派，故宗太仆，而虞山钱宗伯则太仆之功臣也。^③

归庄此序，将“吾邑文派”进一步明确地标出了“嘉定之文派”，并认为钱谦益是使人们认识归有光及其“嘉定文派”的“功臣”。钱

① 乾隆《嘉定县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2页。

② 归庄《历代遗民录序》，《归庄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171页。

③ 归庄《侯研德文集序》，《归庄集》，第215页。

谦益与四先生及黄淳耀友善，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他首先认识李流芳，因为他们“同举乡榜，镢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又“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其中程嘉燧与他“耦耕结隐，衰晚因依”^①，关系更非同一般，甚至有人认为《列朝诗集》本为嘉燧所编著。正因为钱谦益“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②，认同了归氏文派。至于黄淳耀是他点名请他来家坐馆教儿子的，谊在“师友之间”^③，这种种关系，无疑使钱谦益对这批嘉定文人有特殊的感情，以致如对程嘉燧的文学成就的评价或有过当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他对归有光及嘉定文派的推崇是从实际出发的，不但显示了他的识力，而且也得到了舆论的赞同与历史的考验。归有光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散文发展史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他的影响下，朱之素、归庄等标榜的“嘉定文派”也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如黄宗羲在论及当日“时文之士”“竞为模仿”震川，“改头换面而为古文”时，说到“震川一派，遂为黄茅白苇矣”^④。另一位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浙江人陆陇其，在论当时著名的散文家汪琬推崇归有光时，也说“盖其意中自以为接震川一派”。^⑤黄、陆两人的话都从一个侧面承认了自归有光以下的嘉定文人自成“一派”。乃至如山西著名的学者阎若璩也在当时说：“隆庆以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得有光之真传也。”^⑥这都可说明“嘉

① 钱谦益《张子石六十寿序》，《钱牧斋全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页。

② 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钱牧斋全集》第六册，第1347页。

③ 钱谦益《张子石六十寿序》，《钱牧斋全集》第五册，第929页。

④ 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南雷文定》三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第468页。

⑤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2页。

⑥ 光绪《嘉定县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二册，第2491页。

定文派”在清朝前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与肯定。

从以上诸家所论中可见,明代的“嘉定文派”起自归有光。归有光尽管是昆山人,但他的主要讲学与文学活动是在嘉定安亭的二十年中,当时“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①,其中“执经问学者嘉定尤多”,如唐时升之父亲钦尧、李流芳之伯父李汝节等就与他交游或就学,从而团结、培养与影响了一批人才,致使“其后府君之文章昆山遂无传,嘉定则有唐叔达、娄子柔两先生”^②。而嘉定尽管“邑之有诗,自宋龚氏祖孙(龚识等),召著于黄姑村”,后又有侨居的杨维桢“诗雄元明之际”,同时有王彝“杰唱风雅,造格精醇”,与杨对垒,嘉靖间有徐学谟者位高权重,对邑中文人也多有影响,但他们都未能在嘉定形成一个文学的流派,只是归有光,虽然在其生前未曾有意高立坛坫,拉帮立派,但事实上使“嘉定之老生宿儒,多出熙甫之门,故熙甫之流风遗论,叔达与程孟阳、娄子柔皆能传道之,以有闻于世”^③,自然逐步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得到了后来者所公认。如康熙《嘉定县志》说:“……至玉峰归熙甫,读书邑之安亭里,崇正黜浮,卓然以古文名世,人皆效慕,独吾邑为得正传。唐、娄、程、李四先生,追蜀先民源流,似续烂然可睹也。”^④乾隆《嘉定县志》也说:“杨铁崖文名雄东南,而王常宗斥之为文妖。王弇州主盟文坛,而归熙甫讥之为妄庸人。两先生巨眼何其后先合符哉!顾《妫蜺子集》今再版刻,好之者卒鲜。安亭风流再传,而遂有唐、娄、程、李,号‘嘉定四君’。天、崇之际,归氏遗集几如日星矣。虽唐、娄尝及弇州之门,而一瓣香终在熙甫。嘉定古学见推海内,有以也夫。”这里都点明了“嘉定文派”始于归有光,继之以“四先生”。

① 唐时升《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代》,《三易集》卷一七。

② 归庄《简堂集序》,《归庄集》,第217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0页。

④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九,《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二册,第754页。

至于再后，一般又举黄淳耀为核心人物。如王鸣盛说：

吾乡胜国诸先辈，多以古文辞著称，鲜有及韵语者。……嘉、隆以降，唐叔达、娄子柔、李长蘅、徐汝廉四先生，师法归太仆，楮柱王李颀波，而诗视宗常篇什亦稍富。贞文黄先生继之，可谓盛矣。要之，精力尽于古文，诗特纵笔而出，盖非其意所属也。^①

因此，所谓“嘉定文派”，就是由归有光所开创，以四先生、黄淳耀等为核心代表的一批文人群体。这一群体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最关键的是，他们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其最鲜明的共同性就是能砥柱时俗的横流，打出鲜明的旗号，“卓然绝出，能转移风气者也”^②。这正如徐乾学在《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中所说的：

太仆之文，宗伯论之详矣。然宗伯恶夫裨贩剽贼、掇拾涂泽之流，而余独谓夫文章之递变，非一世之积也。宋之推经术者，惟曾南丰氏，然以较于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后，诸儒之说盛行，于是学者莫不拟之而后言，随其所见之分量浅深大小以发之于文，则莫不有所合。自南宋历元，以及于明之初年，其所称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风格蓂莢益颓而为老生学究之习，若是者虽大儒不免也。负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说，则不难一切抹杀理学之绪言，反而求之秦、汉以上，虚气浮响，杂然并作，至欲远驾于古之作者。夫天下有离理而可以

① 王鸣盛《秋左堂集序》，《嘉定王鸣盛全集》第十册《西庄始存稿》卷一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1页。

② 董正位《归震川先生全集序》，《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为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几至于亡者，亦相习而相矫以然也。

太仆少得传于魏庄渠先生之门，授经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时之讲道标榜者为非。至所论文，则独推太史公为不可及。尝自谓得其神于二千年之上，而与世之摹拟形似者异趋。故余谓文至太仆，始称复古。非太仆而言文者，明中叶之病于剽窃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为剽窃而犹未尽乎文之极致者，时代压之，风格薈蒨者是也。欲知太仆之文，必合前后作者而观之，则文章之变尽此矣。^①

这段文字较长，不为一般论归文者所重视，但其实非常重要。其不同于一般论者认为归有光仅仅是反王世贞等七子复古剽窃之类的说法，而指出了归有光反的是自宋、元以来的一股强大的、积重难返的拟古、剽窃的潮流，转移了文学风气。

归有光反潮流，打出的是“学古”的旗号。他在《山斋先生文集序》中说：“余尝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②他将学文的目的归结于“学古”，换言之，“学古”才是做人作文的根本。这就不难理解侯峒曾将嘉定文派称之为“深心好古”的“古学一派”了。然而，“学古”这旗号既冠冕堂皇，又十分模糊，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各种各样的“学古”。比如，有人就首先将归有光的学古指向宗经，学儒家的六经。如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熙甫为文，原本六经”^③，在《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中又说“先生钻研六经，含茹洛、闽之学而追溯其元本”^④，后来者往往称有光“其学湛深经术，尤精于《易》”云云^⑤。其实，六经对于当时一般的

① 徐乾学《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震川先生集》，第5—6页。

② 归有光《山斋先生文集序》，《震川先生集》，第25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第559页。

④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震川先生集》，第7页。

⑤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〇，《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三册，第2287页。

文人学士而言,人人都要花工夫学的,而归有光一派文人,显然都不是穷经皓首的经学家,他们与真正沉醉于六经之中的经学家是很有距离的。钱谦益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门面话而已,因他接着就说归有光的学古是:

少年应举,笔放墨饱,一洗熟烂;人惊其颀颀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荡,得之庄周者为多。壮而其学大成,每为文章,一以古人为绳尺,盖柳子厚之论所谓“旁推交通以为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参之《孟》、《荀》以畅其志,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先生独深知而自得之。钩摘搜猕,与古人参会于毫芒杪忽之间。^①

这就大谈其阅读面之广了。实际上归有光他们学古的真正特点就在于广,不设门槛。与此相应的是,在文学典籍的学古方面也是反对文必秦汉,而是强调秦汉以降到唐宋都可学。在这里也就与七子划清了界线。

他们学古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学经典的门面话,不将经典作为敲门砖,也不仅陶醉于文献训诂之中,而是重在学习一些立身行世的真精神。上文引及《山斋先生文集序》中所论“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之后紧接着说:

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顾徒以科举剽窃之学以应世务,常至于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谓有用者,非有得于古文乎?

^①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震川先生集》,第7—8页。

另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更是谆谆教导学生要远避“俗学”，不要将读书的目的只限于科举，清晰地阐明了“通经学古”的真精神：

有光疏鲁寡闻，艺能无效。诸君不鄙，相从于此。窃以为科举之学，志于得而已矣。然亦无可必得之理。诸君皆禀父兄之命而来，有光固不敢别为高远，以相骇眩。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陈说于吾前，独能顽然无概于中乎？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趣融液，举笔为文，辞达义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远矣。

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则区区与诸君论此于荒山寂寞之滨，其不为所嗤笑者几希。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要之，穷达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过酣豢富贵，荡无廉耻之限，虽极显荣，只为父母乡里之羞。愿与诸君深戒之也。^①

从中可见，他提倡学古，首要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生修养和精神境界，也只有这样“本原洞然，意趣融液”，才能“举笔为文，辞达义精”。同时，通经也为了致用，“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他在《赠阳曲王公分守太仓序》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倡

① 归有光《山舍示学者》，《震川先生集》，第151页。

“读书学古，识治务知大体之为先”，不作“俗吏”而能“大任于天下”^①。归有光一生就忠实地实践了这种学古的理念，读书教学都并不汲汲于名利，而注意通经致用。他写的《论三区水利赋役书》、《三途并用议》等，都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林纾称为“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后海瑞“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②。后来的四先生都是人格高尚、淡泊名利之士，诚如清初王士禛所说的：“四先生之所长，不必尽同，而其渊源古学，不逐时好为向背，则一也。”^③四人中的李流芳还算考中过举人，但他在天启年间，见政治昏暗，即绝意进取，与举业决裂，说：“方今时事多艰，乃国家需才之际，此非伊吾向窗帖括干时者所能办也。”他欣赏的是做一个“经济伟人”^④。再如唐时升，即有志于经世济人，“未三十谢去举子业，读书汲古，通达世务”，其为人“志大而论高，平居意思豁然，独好古人奇节伟行，与夫古今谋臣策士之略。讨论成败兴亡之故，神气扬扬，若身在其间”。^⑤后来的黄淳耀更是读书务本，躬行实践，不趋于荣利，不拘于道学，“盖尝求义理于六艺，求事迹于二十一史；求万物之情状于骚赋诗歌，求载道之器于汉唐宋数十家之文章”^⑥。三十九岁中进士，当“诸公赴馆选如渴”之时，他却“掩门独坐”不谒选，不屑“为三年一个的人”，而追

① 归有光《赠阳曲王公分守太仓序》，《震川先生集》，第204页。

② 丁元正《修复震川先生墓记》，金吴澜辑《归顾朱三先生年谱合刻》第一册附《丁明府元正修复先生墓记》，嘉兴金氏清光绪六年刻本，第45b页。

③ 王士禛《嘉定四先生集序》，《王士禛全集》第3册，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985页。

④ 李流芳《徐陵如制义序》，陶继明、王光乾校注《嘉定李流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196页。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第579—580页。

⑥ 黄淳耀《上座师王登水先生书》，《陶庵全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